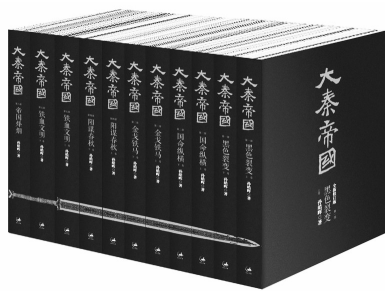


大有读书茶座

《大秦帝国》与重建中国文明

中央党校培训部举办第十九期大有读书茶座



3月16日晚,中央党校培训部举办第19期大有读书茶座,历史小说家、西北大学特聘教授孙皓晖携其著作《大秦帝国》做客茶座,与学员交流分享“《大秦帝国》与重建中国文明”。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出席并讲话。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侠,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东京、教育长罗宗毅出席活动。

孙皓晖形象生动细致地向学员展示了秦朝这个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典型历史剖面以及从春秋战国到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改革、进取、阳刚、理性、开放、包容向上的精神品质。他谈到,《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向我们呈现了中国统一文明创建的历史过程,充分挖掘了中国原生文明时代具有继承性的价值观,同时也深入总结了中国文明第一次重建时代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现场多位学员就思考的问题与孙皓晖进行互动,学员们提出的一些高质量问题,为活动增添了厚度和深度。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在点评时指出,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历史资源和积淀是我们今天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资源和根基。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封闭起来,要善于借鉴西方文明成果为我所用。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在讲话中指出,本次活动准备充分、主讲内容丰富、互动交流热烈,效果很好,有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他强调,大秦帝国的崛起有三个关键因素。一是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的内核就是富有血性、不屈不挠、励精图治、奋发崛起。今天中国的和平崛起,依然需要弘扬这种精神力量,在全党全民族汇聚起豪迈磅礴的精神伟力。二是有雄才大略的政治人物。秦国从积弱积贫走向强大繁荣,重法图强的秦孝公、开疆拓土的秦惠文王、灭周迁鼎的秦昭襄王、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发挥了重大作用。三是有秦国人的不懈奋斗。秦国从公元前356年实行商鞅变法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用了135年。这个胜利和成就,是几代秦国人甘愿为国家赴汤蹈火、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差不多也是130年左右。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为党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只要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共产党员甘于奉献、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宣宇才)

写在《文化视野》起步之时

□ 冯鹏志

编纂一套综合性的人文学系列图书,努力从包括文化、历史、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和文化实践等多维度在内的人文学视角来反映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化研究的状况,是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同事们多年来的愿望。

从延安时期的历史教研室、语文教研室,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史教研室、新闻教研室,再到今天的文史教研部,在时代的磨洗中,中央党校的文史学科走过了辉煌的岁月,也承续着传统的荣光。冯雪峰、成仿吾、范文澜、吕振羽、何其芳、邓拓、穆欣、胡绳、何家槐、周文、蔡仪等名师大家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刘景璐、李书磊等知名学者,都曾领銜并任教于中央党校的文史学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更为晚近的当代中国文化史时期,这些名师大家不仅以自己的人文学识和思想创造强有力地回应着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提出的时代课题,也为中央党校文史和文化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其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永远值得回望的高标。所有这一切,正是我们今天能够寄望于从人文学的视角来思考中国、反映中国、建构中国的基石和动力所在。

从人文学的角度来看问题,所得之视界是否即作为一种文化的视野?所谓的文化视野,其内涵究竟何在?通过文化的视野,我们又能得到与其他学科视野相比的什么样的独特景象和收获呢?正是在这样反复的思考与追问之中,我们筹划推出《文化视野》系列图书。

文化的视野无疑是中国自近代以来逐渐建构起来的一种内在的、自觉的视野。百余年来的中国,几度雨打风吹、鸡鸣不已,如今终于能够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重塑文明大国、东方大国的形象。而在经历了一番改革开放以来转型疾走的艰苦奋斗和卓越创造之后,今天的中国又该如何来对曾经的历史、当下的境遇和未来的前景有一番更为全面、清新而睿智的文化审视与展望呢?显然,五千年文明薪火的接续传扬,复杂而多维的近现代史的重新叙事,文明复兴中国梦的庄严登场,信息化时代多样而勃生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微叙事,既呼唤着今天的中国有更具自觉、更具创造性的思想回应,也期待着一种更具主体性、内在性和综合性的整体目光。而这样的回应、这样的目光,既要奠基基于与中国道路相生相伴的中国精神和中国自信,也必然要从文化上开启出一个全新的视野。

文化的视野是一种时间的视野。文化本身是一种时间的存在、历史的存在。正是因为时间的确立和引入,文化才得以成为人类既可以安身立命,又可以不断实现自我确证、自我完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对象性存在。就此而论,文化的视野永远贯通着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当时与记忆,也必然要突破“传统—现代”这样的二分法的思维局限,引导着我们去踏勘和进入中华民族悠久而日新的生命长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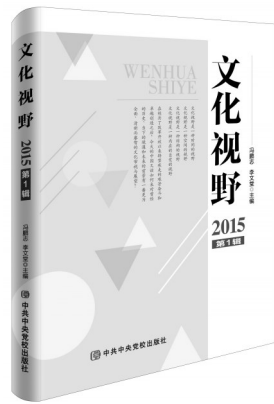
文化的视野是一种空间的视野。文化也是族群的、地域的存在。正是由于空间的确立和引入,文化才得以成为人类既可以

参天地赞化育,又可以不断实现由乡土到城市、由城市到区域、由区域到国家进而到天下的主体性力量。就此而论,文化的视野永远关联着故土与他乡、社区与远方、内陆与边疆,也必然要超越“中心—边缘”这样的二分法的思维局限,引导着我们去体验和把握中华民族浩阔而开放的庙堂与江湖。

文化的视野是一种结构的视野。文化是一种关系的、互为对象的结构性存在。正是由于结构的确立和引入,文化才得以成为人类既可以自我定位、自我安顿,又可以不断实现更高的精神追求、更终远的生命关怀,从而能够合天人于一体、引小我入大我、由物质到精神、从肉身到心灵的路径和方向。就此而论,文化的视野永远穿越着内在与外在、内涵与表象、反映与象征,也必然要拒绝“我者—他者”这样的二分法的思维局限,引导着我们去延续和重张中华民族沛然自立而仁恕并重的正义之光。

合而言之,在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深度缠绕,历史性、当下性和未来性紧密交织的时代,不论是时间的视野、空间的视野还是结构的视野,都需要回归和整合而成为一种“中国的视野”,否则的话,所谓的文化视野就难免要流散于一种虚幻和臆想。事实上,自近代以来很长的一个时段里,在西潮涵涌、西学张扬和西方扩张以至于像“中国没有历史”这样的哲学妄语都能够成为思想史的时候,我们的确对中国远离得太多、忘记得太多、亏欠得太多。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和中国精神的彰显,



我们面对的文化问题正更趋复杂,人文的思辨也随之加深,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的相互质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倡,文化强国目标的提出,民族文化品位的提升和思想的开放多元包容,等等,所有这些大时代的大课题都正在以难以想象的复杂性激荡着当代中国的文化观。因此,当今天的中国又重新汇聚起世界目光、重新复兴为文明主体的时候,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国道路的参与者、实践者、记录者、反映者和思想者,我们所要追寻和展开的文化视野,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有责任让文化在中国的前行和秩序中成就大道,更有责任让中国在文化的怀抱和注目中迈向天下。

日月之行,文化其中;星汉灿烂,中华其里。衷心希望我们的这一番努力和正心诚意,能够得到大家的真切指点和理解,也盼望有来自五湖四海源源不断的支持与鼓励。

序与跋

人为什么要负责任

——读《责任论：一种新道德理论与实践的探究》

□ 徐月高

责任问题研究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而逐渐成为“显学”。程东峰教授早在1994年就出版了《责任论》一书,对责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20多年来,他坚持以责任之心研究责任、探寻责任,在责任研究领域跋涉深耕。他的新著《责任论：一种新道德理论与实践的探究》(以下简称新《责任论》),凝聚着他

对责任问题的新观察新思考新认识。有人说,20世纪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责任问题。那么,什么是责任?责任与人有什么样的关系?人为什么要负责任?新《责任论》对此给予了回答。

人类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更是一个责任共同体。只有人人负起责任,社会才能保持秩序且充满活力。新《责任论》指出:“责任是行为主体对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定在任务的自由确认和自觉服从。”责任以“角色”为中介,以“定在”的“任务”为基础,以“自由确认”为前提,以“自觉践行”为特征,以“责任实现”为目的,以“责任追究”和“责任赏罚”为监督,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角色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定位,有关系就有角色,有角色就有责任,有责任就要担当。“责任”永远和“角色”相伴随。不但个人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社会组织也要承担其“角色”该负的责任。没有完成任务是失职,失职就要追责。责任政府,首问负责制,都是“追责”“问责”和“负责”的基本要求。“自由确认”和“自觉服从”是由“定在”的“任务”变成“自觉”的“责任”的中间环节。从这一系列推理中可以看到,每个个体作为社会人都有定在的任务,完成定在的任务,既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需要,也是社会人生存、生活、发展的需要;不履行这些任务就要给他人、给社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和危害。主动自觉完成任务,是行为主体为“责任”驱使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生活态度;被动强制完成任务,或者是因能力不够(或因偷奸耍滑)而逃避责任,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定在的任务是客观的,不自觉主动完成,要么由别人代做,要么任其“阻碍”“妨碍”“危害”自己或别人的生存和生活,甚至危害社会、危害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对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对有意逃避责任的人,一定要追究其“逃责”“失责”的“责任”。这是新《责任论》阐释的基本道理。

仅仅知道什么是责任还不够,还要明白应承担哪些责任,怎样承担这些责任。新《责任论》详细论述了“责任认同”“责任教育”“责任实现”“责任评价”“责任监督”“责任赏罚”。这些都与“责任能力”和“责任实现”有关。责任能力不仅仅是责任实现能力,还包括责任认知能力、责任判断能力、责任评价能力、责任失误补救能力。这些能力的获得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知识问题、能力问题,还是道德问题、担当问题、思想境界问题。责任能否实现、怎样实现,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关。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责任观;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会有怎样的担当精神;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怎样的责任态度。这就把责任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更高的层次。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道德责任与责任伦理”“责任与自由”“责任与社会主义道德”“责任与传统伦理道德”“关于责任研究中的几个概念的辨析”等几个问题,作了探索性的研究,也值得关注。新《责任论》还专设了“责任分配”一章,对责任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责任分配不同于一般的财富分配。责任分配既是社会角色、社会责任的分配,又是职位、权力、权利、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的分配。因此,责任分配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更为根本的是,它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还关系到“资源共享”。如何对待“责任分配”,如何进行“责任分配”,是衡量社会制度“性质”的试金石。虽然新《责任论》没有提到“共享”一词,但如何分配责任,就是如何对待“共享”,亦是如何“公平分配”的问题。政府和各类管理者把“责任”作为工作的推手和抓手,其实,这个推手和抓手就是“责任分配”和“资源配置”。“人力资源”分配是比“物质资源”分配更为重要的分配。因为“责任分配”既关系到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又关系到社会活力和国家富强。在新《责任论》“公仆责任”一节中,作者还深刻分析了领导干部应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在中国,在当下,人才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国家将兴,必须“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书而思



粟特本土发现的壁画——粟特商队

据中国史书《隋书》记载,粟特人先民原居祁连山下“昭武城”(即今甘肃张掖),后为匈奴人所破,被迫西迁至中亚,并建立了康安等一系列小国。对粟特及其所建之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域地区的历史、中西交流史以及文化的融合与变迁。由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康马泰所著的《唐风吹拂撒马尔罕》于2016年11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其敏锐的艺术洞察力,从美学考古出发阐述了粟特艺术与中国的波斯、印度、拜占庭之间的关系。

粟特在中国的文献中多以“昭武九姓”或“九姓胡”出现,记载较少,以至于后人难以窥测这强大而神秘的群体如何在中亚起源、发展强大以及消失,留下了许多待解之谜。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播与沟通的重要途径。从公元2世纪到8世纪粟特商旅及使臣穿梭于中亚、南亚之间,却鲜有粟特文书传世——现存粟特语文献除了极少的经书,很少有世俗文献。粟特人往来丝绸之路,穿梭于宫廷与草原汗国之间,翻译宗教文书,传播宗教,但鲜少用粟特语撰写和传播。现存的粟特语所书写的经书,有可能是根据已翻译成中文版的佛教经书再翻译编纂而成的,那即是粟特人曾参与将梵语经书直接翻译成汉语,而不是粟特语,后来的粟特人又根据已经翻译成的汉语经书译成粟特语版本。

粟特所留传世文献非常稀少,而其遗址也早已湮没,但通过康马泰的这本书,我们离历史

真相又近了一步。从全书四卷来看,初看各卷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各自分章而论。但实际上,在粟特艺术这一文化纽带下,四国产生了一些互动,四国的文化里都有粟特式的因素。

康马泰教授给了我们多重惊喜。在《最后的波斯皇室在唐朝》一文中指出了《旧唐书》将卑路兹父子糅为一人的谬误,《新唐书》中关于卑路兹之子泥涅师的记载是清晰准确的,还提出洛阳出土的墓志铭中的波斯人阿罗撼可能就是卑路兹的兄长,其子居洛可能就是泥涅师失败之后继续到大夏抗击大食的库思老王子。在《寻找〈西域传〉中的堡国》一文中,作者运用汉文史料、粟特语言学与意大利考古队近年在布哈拉古城的考古发现相印证,驳斥“白题国”说、“西安国”说,力证实为布哈拉附近的堡丹译遗址。

丝绸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品,在丝绸之路沿线也出土了大量的纺织品。图案之精美、做工之优良令人惊叹,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精美的物品从何来?何人制造?又属于何人?这本书从文化属性出发,详细地分析了其传播、变化的艺术表象和内涵,论述了拜占庭、波斯、粟特、突厥、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互动。

粟特人多元的文化属性、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成就了其活跃于丝绸之路数百年不衰,成为各国的座上客和显贵。粟特人从6世纪开始懂得蚕桑和丝绸织造,之后粟特丝绸很快就达到一个艺术巅峰,铺陈锦绣,风靡海

外,引来追仿。粟特人将起源于萨珊波斯王朝的联珠纹,经过改进和传播,在丝路各国广为流传。粟特人也因此攫取了大量财富,在8世纪时,唐朝曾试图通过禁令遏制在华粟特人对纺织品的制造与贸易。

粟特人似乎像海绵一样吸收了他们遇到的每一种文明的精华,经过冲突、融合及变迁形成自己独有的“粟特式”。尽管经历了萨珊波斯、白匈奴、突厥、唐朝、吐蕃、大食多种异族统治,粟特本土还是成功地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貌,甚至反过来深深影响了所有统治这里的征服者们。

丝绸之路上有过四个独立的文明圈,分别是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伊朗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粟特与中国、与印度、与波斯、与拜占庭文化的互动。我们可以从粟特人带额的突厥使我们往君士坦丁堡、粟特人担任回鹘国师并使其信仰摩尼教等事件中,看出粟特人重要的角色。粟特人极具包容的文化属性,使得祆教、佛教、印度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都在其本土流行过。而粟特人又似乎非常热衷于传教,可以说粟特人将宗教从起源国输入后,再将其“粟特化”的输出。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粟特艺术为何与中国、印度、波斯、拜占庭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丝绸之路上至少有三种织锦纹样归功于粟特人,即单兽、双兽、赞丹尼。有意思的是这些纹样几乎不见于粟特本土。单兽纹

感受有温度的丝路古史

□ 柴小君

样只见于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唐代丝绸残片中或唐代宫殿壁画中,在西方国家没有留有痕迹;双兽纹样是面面相对的动物在联珠圈内,几乎不见于粟特本土、波斯、拜占庭诸国,是入华粟特人创造出的纹样,被汉文典籍称为“波斯锦”或“番客锦袍”,被唐王朝用来赏赐番邦的使臣,在松赞干布之后的吐蕃王朝大为流行;赞丹尼锦同样不见于粟特本土,其风格受西亚—波斯影响,主要发现于西欧教堂,用于保管基督教遗骨圣物,敦煌地区也有发现。粟特人非常善于应对不同环境,同时频繁地学习和模仿,无论是从宗教、艺术还是语言,也许正因为包罗万象,更迭频繁,才没有保住显著的粟特特色,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

书海泛舟